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潘 洵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重庆市 400715)

【摘要】: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社会变迁;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5)06-0115-04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持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由于日机的持续轰炸,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

大面积毁坏,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重庆市区主要街道被炸成一片废墟^[2](p94)]。而在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也无法实施必要的规划,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其他一切都置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受到忽略,“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它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3](p514)]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对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也有比较多的研究。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由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激发了重庆人民反对侵略反对轰炸的坚强决心,饱受日机轰炸灾

¹收稿日期:2005-07-28

作者简介:潘洵(1965-),男,重庆市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

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于战时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客观上也加快了重庆城市发展的步伐。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重庆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1939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城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损毁建筑4871栋,炸死市民4572人、受伤3637人^[4],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重庆陷入了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由过去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101号”作战,从5月至9月,连续不断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数十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重庆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台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日军“101号”作战结束后的第二天便通令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城市地位进一步提高。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公里^[5]。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纷纷集中重庆,迫切需要扩大城市空间。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轰炸损失,早在1939年2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邀请各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3月底,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又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川黔、成渝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

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为市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而战时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扩大市区。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

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城区建成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6]。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此外,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尽管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修建防空洞壕,进行人口疏散,重庆市民仍然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据抗战胜利后重庆市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市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5294和20908人,共计36202人^[7]。

事实上,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市容卫生很差,加之防治工作落后,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致数十人死亡^[8]。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达200多人^[9]。

日机的轰炸,还导致大量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在此期间,重庆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大量沦陷区难民继续向重庆集中,二是大量已经居住重庆的人口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向四周疏散,三是在雾季到来之后,又有不少疏散乡下的人口回流市区。其中后两种流向完全是受日机轰炸的影响和制约。

1938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而市民自动迁乡避难者,每日数十百起”^[10]。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3月以前,政府当局历次疏散的市民多达16万余人^[11]。“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视疏散市民为首要,在短短的三天之内疏散了25万余人^[12]。加上此前疏散的16万,疏散总数超过41万,而据当年重庆市的人口统计,当年疏散后的市区人口也只有41万多人^[1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而流向了郊区。而据当时居住重庆的外国友人王安娜估计,疏散人口约占市区总人口的4/5^[14]^(p310)。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雾季一过,疏散工作便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政府当局为避免无谓牺牲,或劝导、或强制疏散市民,1940年和1941年疏散人口均在20万左右^[15]。

与此同时,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迅速增加,沙磁文化区1936年有人口38566人,而到1941年,全区人口增加到136719人,增加近10万人之多^[16]。而北碚人口由1936年的32065人,增加到1940年3月的97349人,在三年多时间内,净增人口65284人^[17]。

但是,由于不少疏散或迁建地区治安混乱、生活困难,“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免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战区涌入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2]^(p318),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因此雾季到来之后,不少疏散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城市。日机轰炸下大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常流动,从总体上讲,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市民的负担,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日机的轰炸还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孤儿,据《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18],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即达二万人左右^[19]。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20]。躲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长达96小时,市内水电皆断,市民断炊失眠,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日机的轰炸,加剧了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引起了住房拥挤、交通瘫痪,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2]^(p135),致使重庆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房荒”。“重庆找房子,真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城里不谈,当然早已塞得实实足足,城外乡村之间,也是毫无隙地。……偶然闲步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蓬草屋门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晒晾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出重庆住的写真。”^[21]^(p35)

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21](p35),“其外表有时甚整洁,而内部固甚薄弱”^{[3](p514)},既不牢固安全,又无必要的生活设施。建造之时就没有作永久性打算,绝大多数房屋结构简易,使用年限短,到抗战胜利之时,大部逐渐破损。在防空设施方面,1938年重庆有各种防空设施容量不足7万人^{[2](p218)},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民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到1941年统计,全市公共防空工事容量达12.51万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33.66万人^{[2](p220)}。据《大公报》1941年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22]。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一担水费相当于1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1942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988盏^{[3](p482)}。在此情况下,一些路灯被毁而又必须保证夜间照明的重要地段,不得不改用油灯补充^①。

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正如《国民公报》一篇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23],日机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没有使重庆人民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宗教的热忱,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24]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竭诚报国,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在患难中,大家相互帮助,为了支援抗战、救助难民,出力唯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重庆市民在敌机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25]。

抗战时期在重庆经历过轰炸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不能忘却的。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14](p296)}日本的恐怖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的互助精神”,“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万次政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些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14](p311)}。

斯诺也曾描写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千钧一发的逃难。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26]白修德也有同样的认识,“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20](p262)}。这些外国友人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重庆民众意识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 [2]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94.

-
- [3]张笃伦. 陪都十年建设计划序[A]. 隗瀛涛主编.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 [4]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5月3、4、12、25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总表[A]. 重庆市政府全宗[Z]. 全宗号0053, 目录号12, 案卷号95, 重庆市档案馆藏
- [5]重庆市政府编. 重庆市一览[M]. 1936:63, 藏重庆市图书馆.
- [6]周勇主编.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77-278.
- [7]迟景德. 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迹[M]. 国史馆印行(台湾), 1987:239.
- [8]韩渝辉主编. 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317.
- [9]罗传勛主编. 重庆抗战大事记[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53
- [10]渝人口减少约六分之一[A]. 重庆:国民公报, 1938-02-10.
- [11]渝市四十二万人口已疏散十六万余[N]. 中央日报, 1939-03-16.
- [12]周开庆. 民国川事记要:下册[M]. 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2:74.
- [13]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编印. 重庆市统计提要:表6[M]. 重庆市图书馆藏, 1945.
- [14]王安娜.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M]. 北京:三联书店, 1980:310.
- [15]王孝询主编. 重庆大轰炸[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377.
- [16]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M]. 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9:258.
- [17]何建廷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M]. 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1992:2.
- [18](台湾)秦孝仪主编[J]. 革命文献:第100辑. 1984:212.
- [19](日本)桥本学. 重庆的抗战[J]. 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100.
- [20]白修德, 贾安娜. 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A].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 外国人士作品选[C].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65-266.
- [21]思红. 重庆生活片段[A]. 施康强. 四川的凸现[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35.
- [22]空袭伤亡已渐次减少, 仍望市民及时入洞[N]. 大公报, 1941-06-04.
- [23]镇静奋斗, 救济同胞[N]. 国民公报. 1940-08-22. [24] 要悲壮才能胜利[N]. 中央日报, 1940-06-18.

[25] 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大会”上的致词[A].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634.

[26] 斯诺. 斯诺文集(III)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125、128